



中国江南水乡文化博物馆的这个展很特别,你家的老物件也可能成为展品

“居家考古”拼起百年临平



当你走进一家博物馆,文物的展签上都会标明“XX博物馆”或是“XX地出土”。但走进中国江南水乡文化博物馆(临平博物馆)的展厅,许多展签上署的是人名“李XX提供”“王XX提供”……怎么回事?

一场特别的展览正在展出——从9月起,临平人开始了一场“寻宝游戏”:许多居民在自家“考古”,寻找出承载着临平记忆的老物件。这是为了响应临平博物馆的一项征集——这些“居家考古”的成果将做成一个“临平记忆”,展览通过“老临平人”口述史的方式串联,展品来自千家万户,讲述百年间的临平历史。



展厅一角 刘玉涵 摄

城事寻迹

抢救记忆

海报上“临平记忆”四个字特意设计得有些模糊,代表着许多有关临平的历史记忆正如风过沙丘,开始消散。

策展人严石涵举了个例子。

临平博陆曾生产过一款“长生牌”电风扇,当年在杭州及周边卖得火热。他和上了年纪的老人提起,他们都能叫得上名字,但在网上却搜不到什么相关信息。一款上世纪销售量可达千万的产品就这样在光阴中黯淡了。

类似的情况比比皆是,而且仍在发生。

“消亡不是一件开心的事。”策展团队在策展过程中十分真切地感受到,那些并不遥远的记忆正在加速消失。

“虽然现在是在信息时代,但是如果一件事、一个东西的热度散去,互联网的记忆都会变得不可信。”中国江南水乡文化博物馆副馆长、策展成员之一的于秋娜觉得很遗憾。

策展团队经常觉得,自己像是在做遗产保护,因为在过程中不断发现又少一样东西、又少一样东西……遗憾的同时,他们生出一种使命,把这些记忆尽量多地保留下来,为临平的近现代史办一个展览,把本地的历史向公众讲解清楚。

这个计划其实很早就做了,但展陈的思路几度更换,最终团队在当地编纂的一套《口述余杭历史》中获得灵感。

这套书收录了许多余杭人的口述故事,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。以此为基础,团队又走访了多位老人,最终选取了最有临平特殊记忆的角度,讲述临平的交通、通讯、票证、影视、公社、老字号、丝绸工业……

就像老人们围坐在大树下给子孙们讲故事,口述拉近了展览与观众的距离。严石涵希望,一段段记忆和一个个观者可以在这里面对面。

重识临平

严石涵从没想过,自己也会在家中找到“临平记忆”。

他并不是本地人,但在家里翻箱倒柜的时候,意外“考古”到一张1951年的《解放日报》,有一个大版面写着“浙江省临平区”,介绍了临平当地的新闻。他还在家中的一件织物上,发现了临平丝绸式样厂的标识。

握着实实在在的纸张和布料,他忽然感受到自己与临平的联结:“产生了一种‘挖宝’的

快乐。”这样的意外之喜不断地发生着。

他在策展过程中第一次知道,原来风靡一时的小灵通,是从临平“走出去”的。

在21世纪初,小灵通几乎人手一个。但鲜少有人知道小灵通是在1998年首次在临平超山开始测试,1998年在全国率先开通,从此走向千家万户。

虽然小灵通是中国通讯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产物,但现在网上的信息少之又少,更是没有提及“临平”的内容。于是,严石涵找到了关键性人物——引进并且改造技术的“中国小灵通之父”徐福新,帮他一起翻找以前的笔记,来确认具体的时间、地点等信息。

创业之初是企业最艰难的时光,也最具有研究的价值。后来,小灵通还经历了一系列通讯业变革。严石涵一直寻到中国电信临平分公司的档案库,和师傅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,才翻到一些照片。

那些照片被扫描出来,和小灵通实物一起展示给大众,告诉观众,临平在这段通讯史中承担的重要角色和资料。

展品中还有一件宝贝——原来,新中国第一张博士学位证书发给了临平人。

证书原件在中国国家博物馆,而中国江南水乡文化博物馆收藏了唯一一件复制品。

这本编号“10001”号的博士学位证书属于马中骥。

“马中骥系浙江省余杭县人,一九四〇年三月二十三日生。在我学部已通过博士学位的课程考试和论文答辩,成绩合格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》的规定,授予理学博士学位。”

证书上如是写道,还有时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主任、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钱三强的签名,颁证时间是一九八二年三月四日。

马中骥的祖籍在临平,他在故乡生活的时间不长,但常随家人回乡祭祖,所以将这件珍贵的复制品主动捐赠给故乡的博物馆。

严石涵坦言,这场展览的举办,让他重新认识了临平,也为这一方土地感到骄傲。

在杭州市重新分区之后,临平区从余杭区单独划分出来,如何襄助确立新区域的文化定位、建立老百姓的文化认同,是于秋娜一直在思考的事情。

在近百年的时光里,临平在工业、交通、通讯、贸易、文化、教育等领域均有所成就。通过这一场展览,相信会有更多人,在这些共同的回忆中找到这份认同。

共建历史

展览中的文献和实物达百余件:船票、收音机、汇昌的糕点模具、同福永的酒缸……这些日常生活中的寻常物件带我们走进20世纪的临平,百货商店置景更让人联想到售货员用钢丝“飞钱”收银场景。

但其中,属于原馆藏的展品只有一些属于计划经济时代的票据,其余的展品都来自不同单位的支持,有30件物品来自广大市民。于秋娜笑称,办这样一个展览是“白手起家”。

和更久远的古代历史不同,这百年间的历史与一个个具体的人产生着更为紧密的关联,

9月19日,博物馆@临平人民,集结1912年以来的各种旧物:“这些旧物,可以是记录临平社会变迁的旧照片,也可以是承载临平人梦想与荣耀的老物件,还可以是见证一代代临平人成长的某一历史‘元素’……”

集结号吹响,唤起不少居民的回忆。短短7天,旧物的集结量达到了近百件,共同拼起临平的百年图景。

余杭高级中学(临平中学)的退休教师蒋秋萍就提供了好几件物品。

1968年,蒋秋萍获得了她中学时代最后一张学生证;1978年,蒋秋萍抱着刚满月的孩子复习迎考,考了余杭县理科第二名的成绩;1982年8月,蒋秋萍从浙江师范学院数学系毕业工作,她买了一张杭州公交月票,天天穿越大半个杭州。

一张学生证、一张成绩单、一张月票,薄薄几张纸,记录了蒋秋萍人生中的几个重要节点,也勾勒出新中国的一段岁月。

临平区商务局退休的张炳林翻出了珍藏的三包种子和袁隆平的回信,以及一台大哥大。

他在下乡时,给袁隆平写信请教过种稻,没想到一个月后就收到回信,袁隆平还寄了三包种子给他。后来进入国企的张炳林赶上了国企改制私有化,参加了杭州市第一次大哥大号码拍卖,他所在单位的大哥大号码,最终拍出了12.9万元,比当时全国的最高纪录8万元高出一大截,成为轰动全国的热点事件。

这两段看起来毫不相干的事情,戏剧性地发生在了一个人身上,也戏剧性地浓缩在了两组旧物上。

历史是人的历史,临平的历史由每个人的记忆组成。一个展览就这样丰富、鲜活起来,一段历史也因每个人的描摹而逐渐清晰。

展品仍在征集中,有“考古发现”请联系中国江南水乡文化博物馆。



刘玉涵

行路读书



来阅读我的更多文章吧

本报记者

刘玉涵